

李世忠 著

北宋詞政治抒情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世忠 著

北宋詞政治抒情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词政治抒情研究/李世忠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 8

ISBN 978-7-5161-2944-9

I. ①北… II. ①李… III. ①宋词—诗词研究—北宋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78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张 剑 刘 倩

责任校对 王兰馨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j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4.25

插 页 2

字 数 578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1)
第二节 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	(5)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12)
 第一章 北宋词政治抒情的文学传统与时代背景	(23)
第一节 北宋词政治抒情的文学传统	(23)
第二节 北宋词政治抒情的时代背景	(38)
第三节 北宋文人的坎坷仕途	(54)
第四节 词人政治沉浮与“以诗为词”观念之形成	(77)
 第二章 北宋词政治抒情的发展期	(92)
第一节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政治抒情	(92)
第二节 升平时代的歌者:柳永	(110)
 第三章 北宋词政治抒情的兴盛期	(123)
第一节 苏轼词的政治抒情	(123)
第二节 秦观词的政治抒情	(168)
第三节 黄庭坚词的政治抒情	(210)
第四节 晁补之、陈师道词的政治抒情	(235)
第五节 王安石、舒亶词的政治抒情	(258)
第六节 贺铸词的政治抒情	(290)
 第四章 北宋词政治抒情的衰微期	(315)
第一节 党禁视阙下的清真词	(316)

第二节 徽宗朝词人的政治谏颂词	(331)
第五章 北宋词政治抒情的艺术特点	(343)
第一节 抒情题材的多样化	(343)
第二节 政治抒情意象类型化:以“长安”、“春归”意象为例	(390)
第三节 几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	(409)
第六章 北宋词政治抒情对南宋及金代词人的影响	(431)
第一节 北宋词政治抒情对南宋词人的影响:以姜夔为例	(432)
第二节 北宋词政治抒情在金代词人中的影响:以金代词人 对苏轼的接受为例	(447)
第七章 北宋词政治抒情作品个案考察	(474)
第一节 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考论	(474)
第二节 苏轼徐州作《浣溪沙》五首考论	(490)
第三节 苏轼《渔父》四首考论	(501)
第四节 苏轼《蝶恋花·春景》考论	(511)
第五节 黄庭坚、黄大临三首《青玉案》词考论	(525)
参考文献	(536)

绪 论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

一 “政治”的含义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① 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很多人即以政治家或普通官员身份,处于政治旋涡之中,北宋文人也不例外。本书以北宋词政治抒情问题为研究对象,正是基于北宋政治于词人生活创作之影响极为深刻、复杂,而北宋词又极广泛地反映着北宋时代政治这样一个事实。然而明确界定“政治抒情”这个概念的内涵,却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在词体文学范畴内,究竟什么样的抒情内容,抑或抒情方式,才算政治抒情?政治抒情有什么样的质的规定性?这是本书在展开论题研讨之前必得回答的问题。

政治一词的含义,古今中外,人们的理解并不相同。现代西方政治学家一般将政治定义为制定政策、权力斗争与分配、公共事务中个人利益表达、国家管理等行为。这一解释的代表人物是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马克斯·韦伯也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他说:“‘政治’就是指争取分享权利或影响权利分配的努力,这或是发生在国家之间,或是发生在一国之内的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任务,不被某些政治团体列为自己的工作,但是,也没有什么任

^①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7页。按:本书所引用文献,于各章节首次出现时,详细注明朝代、作者、书名、页数、出版社、出版年,以便复核;再次引用时,仅注明作者、书名、页数,以省篇幅。为统一体例,出版年一律以公元纪年标记。注释号码,统一置于正文或引文标点符号之后。

务，能够说完全专属于以政治为目标组织起来的团体。”^①他还认为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而生存。^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对政治一词的解释是：“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利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组成的特定关系。”该书同时指出，各时代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都从不同角度和不同侧重点对政治一词作过各种论述，“但至今还没有公认的确切定义”。^③

中国古代典籍中，政治一词也并不少见，如《周礼·地官·遂人》中即有“掌其政治禁令”之言，伪古文《尚书·周书·毕命》亦云“道洽政治，泽润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赖”。^④然多数情况下，古代典籍中的“政”与“治”是分开使用的，其意义所指与上述中外关于“政治”一词的解释亦不完全相同。

“政”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主要指国家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如《左传·襄公十七年》载宋公谴责华臣残害其兄子臯比之室时云：“臣也不惟其宗室是暴，大乱宋国之政。”杨伯峻注云：“言华臣不仅欺凌宗室，且大乱宋国之政令。”^⑤又《昭公六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杨先生释“乱政”云：“谓民有犯政令者。”^⑥《礼记·乐记》亦有“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之语，清人朱彬释其意云：“政，法律也。用礼教道其志，用乐谐和其声，用法律齐一其行，用刑辟防其凶奸，则民不复流僻也。”^⑦该书同卷亦复有“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⑧诸语，其所言“政”，均指政令、法令言。而“治”，在典籍中主要指对人的管理教化。如《礼记·经解》云：“安上治民，莫善于礼”；《墨子·兼爱上》亦云：“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治”在此均指实现安定的状态。

由“政”的国家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意及“治”的实现安定状态

①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② 同上书，第63页。

③ 《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481页。

④ 陈戍国点校：《四书五经》，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275页。

⑤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32页。

⑥ 同上书，第1275页。

⑦ （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560页。

⑧ 同上书，第565页。

意进一步引申，政治在古代中国，又是作为一种伦理观念，渗透于人际关系之中而成为德誉的象征。如《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①《论语·为政》载孔子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②《艺文类聚》卷五二《治政部上》释“政”云：“政者，正也，下所取正也。”《礼记·哀公问》载：“公曰：‘敢问何谓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公曰：‘敢问为政如之何？’孔子对曰：‘夫妇别，父子亲，君臣严，三者正，则庶物从之矣。’”“孔子曰：‘古之为政，爱人为大。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朱彬注云：“有，犹保也。不能保身者，言人将害之也。不能安土，动移失业也。不能乐天，不知己过而怨天也。”^③另，《礼记》亦载政治之要务云：“圣人南面而听天下，所宜先者五：一曰治亲，二曰报功，三曰举贤，四曰使能，五曰存爱，五者一得于天下，民无不足不瞻也。”^④

这些都说明了中国古代的“政治”，其含义远比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要丰富得多。政治在古人眼里，不仅是指国家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的贯彻，社会安定状态的实现，而且它更富含道德评价意义。政治之“政”含有道德之“正”意，儒家典籍将政治范域的君臣关系列为“五伦”之首，也说明了在古代中国人观念中，政治与人伦之不可分割。所以，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认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与政治和伦理结合的性质”。当代学者，如刘泽华也认为：“儒家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为一，也就是把道德与政治合而为一。把道德政治化，以道德治国虽不是中国古代所独有，但由于儒家在封建社会占正统地位，因此伦理政治在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有深远影响。”^⑤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政治”不仅是统治的行为描述，亦为道德之极则。政治，在中国古代实具有极强烈的伦理色彩。这一点在学术界已被普遍接受。

① 陈成国点校：《四书五经》，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40—41页。

② 同上书，第18页。

③ （清）朱彬：《礼记训纂》，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41—743页。

④ 杨天宇：《礼记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28页。

⑤ 刘泽华、葛荃：《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导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由此看来，古人观念中的“政治”与今人有关政治的认识实有不小差距。本书既以北宋词为考察对象，那么“政治抒情”一词中之“政治”，其取义亦当和中国古代政治的伦理型特点相关，即“政治”不仅是指以国家权力、制度、法令等实现对国民统治的活动，它更是作为一个渗透在时代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利益诉求及人格风范等道德与生活层面的范畴；“政治”不仅包括统治集团对国家、社会实现统治的手段、方式与结果，同时从参与这种统治活动的个人角度讲，它更是指人们对仕途上出处进退状态的选择与道德评价。

二 本书研究的对象

“政治”既然是一个渗透在时代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利益诉求及人格风范等道德与生活层面的范畴，也包括了人们对仕途上出处进退状态的选择及道德评价在内，那么词体文学中的政治抒情，亦自当指对产生于国家政治生活或个人政治际遇中的复杂情绪的表现。换言之，词体文学中的政治抒情是指词人将自己（或抒情者）作为政治事件当事人或政治生活参与者的内心波澜、情绪状态予以反映，或将自己于政治人物、国家政治状况的态度、观点及由此产生的思想情绪，以词的语言激荡而出。

从文本角度看，政治抒情具体包括了哪些类型作品？笔者认为，因政治抒情重在展示作者（抒情者）于国家政治生活或因个人政治际遇而产生的复杂情绪，故抒发政治情怀作品所涉及题材类型，是相当广泛的。如，登临吊古可引发词人由古及今之感怀，那么讥议时政、感慨世事，就很容易成为这类词作的抒情内容；伤春念远，亦可借以抒写政治进退之意绪；闺情别离，更易渗入政治生活中的悲喜感受。而反映作者于前代政治评价的咏史词，于当代政治或政治人物有所褒饰的应制词、祝颂词，反映抒情者厌战情绪或意欲立功疆场的边塞词，反映靠拢权门、追求功名利禄思想的干谒词，表达向往乡村山林、厌弃政治之情的隐遁词、题赠词，及反映追求政治功名过程中之活动与心迹的科举词、羁旅行役词，等等，这些词题材侧重虽各有不同，然其抒情内容因或多或少涉及词人的政治追求、政治态度、政治生活感受等，故它们实际上都在政治抒情这一概念涵盖的范围之内。以羁旅行役词为例，蒋哲伦认为：“宋代是中小地主阶层参政相当活跃时期，科举制度将天下读书人吸引到州府、京师，又使大批考生名落孙山，侥幸得中的，也大多沉浮小吏，辗转于各地州县。于是背井离乡

的痛楚，便同怀才不遇，仕途蹭蹬的苦闷相交织，构成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心态。”^① 事实亦如蒋先生所论，羁旅行役，实际上并非简单的状写词人旅途劳顿之叹，其中不少是打入了作者政治上不得意之怀抱的。又如，北宋社会自庆历新政以后，党祸频仍，反映政治变故中词人因政治命运沉浮发之于心、应物斯感，记录其思想、情绪、心迹的荣升词、贬谪词等，更是负载政治抒情内容的好题材。

北宋从公元 960 年宋太祖“陈桥兵变”后立国，至公元 1126 年“靖康之变”后灭亡，这段时间中问世的举凡与政治抒情相关的词作，都在本书研究的范围之内。部分词人在“靖康之变”后亦创作了不少反映社会政治生活、抒发其政治抱负的作品，但因其时已进入南宋时代，故本书不予论列。

第二节 课题研究的学术价值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历来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从文学系统本身看，考察文学与政治的相互影响，可加深对文学史的理解，“作家的政治观点，作品的政治内涵，接受者的政治观念不仅在文学史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留下了浓厚的投影，而且当这些观念内涵与审美情感结合为某种政治情结，并历史地积淀起来之后，它本身就构成了文学史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② 同时，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考察亦有助指导文学创作的实践，至其微者，甚或帮助读者解读作品的意义。

政治生活在封建士人的一生中几乎占有绝对支配性地位，其价值观、主体精神、个人理想等都与之联系。所以，没有什么更能比政治上的荣辱、出处、沉浮、进退影响士人的生活状态。以北宋词言，因大量作品并非产生于专职词人之手，词人的官员身份及其于坎坷政治际遇中激荡在词体文学之中的丰富抒情内容，使得我们探讨北宋词政治抒情问题不仅有坚实的文本基础，同时也有很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概言之，有以下方面：

① 蒋哲伦：《词别是一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5 页。

② 覃召文、李晟：《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序言，第 1 页。

一 打开宋词研究新思路

以往关注古代作家创作、文学发展，谈政治经济与大文化背景者多，但这样的讨论常失之空泛。“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就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而言，这是没有问题的。然从文学的具体创造看，创作主体多数情况下是以个体单位进行，即作为精神活动的作家之创作绝对是一种高度自主的个人行为，社会与文化的外部因素也只有通过作家个体这个内部环节才会发生作用。所以理解作家个体生存境遇，或者说属于他的个性化创作生态，对理解其创作状态与作品的精神实质来说，至关重要，也更有价值。如讨论宋词发展繁荣的原因，论者往往认为宋代政权之建立客观上促进了社会繁荣，当权者对文人待遇优厚，提倡享乐文化等，都是其基本因素。如有的论者指出：“就时代背景考察，两宋经济发达，城市繁荣，市民娱乐为之勃兴……极大地刺激了具有演唱功能的词的创作，也为词的普及和推广提供了最充分的社会条件。”^①“(宋代)官员们既有丰厚的俸禄，以满足奢华生活的需要……他们的享乐方式通常是轻歌曼舞，浅斟低唱。”“歌台舞榭和歌儿舞女既然成为士大夫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滋生于此土壤的词自然会异常兴盛”，“整体而言，宋词的兴盛是与宋代都市的繁荣和娱乐业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词是宋代尤其是北宋社会文化消费的热点。由于都市的繁荣……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也促进了词的繁荣和发展”^②，“享乐的风气，就是宋词滋生繁衍的温床”^③等。另外也有论者指出，宋词兴盛“本身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除宋代经济繁荣、都市兴盛，宋廷于文人待遇优厚之外，还有统治者的提倡因素等。^④

但是考察宋词作品个案可见，绝大多数却都不是在歌舞酒宴背景下创作的，更多的作品似乎也并不是城市繁荣、市民娱乐的需要及文人待遇优厚所能催生的。如北宋第一位大词人柳永开启了宋词繁荣之门，但文人“待遇优厚”一说显然与其无缘。唐圭璋认为柳永“约生于太宗雍熙四年

①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②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3页。

③ 陶尔夫、诸葛忆兵：《北宋词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④ 马兴荣等：《广选新注集评全宋词·序》，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87)”^①，《石林燕语》卷六、《能改斋漫录》卷十六都认为柳永登第时间在景祐六年（1034），如是，则正像宋翔凤《乐府余论》所云其“及第时已老”。《福建通志》卷一七五谓柳永登第后“调睦州团练推官，皇祐中（1049—1054）历任屯田员外郎”。团练推官与屯田员外郎在北宋的官僚体系中，地位低下，其年俸收入比之朝官，甚至多数京官差得很远。《镇江府志》卷三载柳永皇祐五年（1053）去世后，王安礼守润州，因其“藁葬久无归者”，王掏钱葬之。那么柳永一生到底能吃北宋政权多少财政饭是可以想见的。又如晏几道，“点点行行，总是凄凉意”，是其《小山词》反复咏叹的主旋律，而他的个人生活更是“仕宦连蹇”、“家人饥寒而面有孺子之色”^②的凄凉无限，他自云“我龔跚勃窣，犹获罪于诸公，愤而吐之，是唾人面也”。黄庭坚认为其词“士大夫传之，以为有临淄之风尔，罕能味其言也”。^③那么小晏的创作就既不是“待遇优厚”所推动，也似乎并不是“社会对词作的广泛需求，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所能说明。东坡词质量数量雄居北宋鳌头，其确曾官高位显，如以演唱需要、“待遇优厚”论其词之成就得来，似乎没有问题。但事实却恰不是这样。薛瑞生将东坡平生所作小词可编年者分作三个创作时期，其“神宗元丰庚申（1080）至元丰八年乙丑（1085）”“黄州与流寓江淮之时”竟达111首^④，六年时间的创作占到其四十二年创作生涯中作品的35%多，而这六年时间里，却正是他黄州“躬耕东坡”及江淮流寓时期，何来优厚待遇？贬谪中的词人精神上苦不堪言，行动上没有自由，在给朋友的信中说“黄州真在井底，杳不闻乡国信息”^⑤，那么，此期的苏轼，其作词又是怎样受城市娱乐业发展影响的？反过来说，当他人翰林，“赐银绯”，待遇优厚、仕途腾达之时，却正是其词创作之低谷期。

秦观三十七岁登进士第，四十六岁，就开始了他的贬谪之路。据徐培均所笺注《淮海词》，其大致可编年作品50余首，而作于登第前、贬谪后之作竟达43首之多。^⑥这两个阶段对秦观来说，当然也无文人“待遇”可

① 胡传志：《柳永集》，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② 黄宝华：《黄庭坚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③ 同上。

④ 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注》，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目录页。

⑤ （宋）苏轼：《苏东坡全集·苏东坡文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6页。

⑥ 参见徐培均《淮海居士长短句》卷上、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言，尤其他以戴罪之身贬谪边远荒蛮之地期间，又何来市民娱乐需要“刺激”其创作一说。

黄庭坚词《全宋词》录190首，《全宋词补辑》辑补2首，马兴荣、祝振玉校注之《山谷词》对其作品编年者103首。然编年作品中，作于词人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至绍圣元年（1094）开始贬谪这二十八年中的仅有17首。相反，从绍圣元年至词人去世的崇宁四年（1105）十一二年中，他却作词86首，占到其全部创作近一半。漫长的贬谪生涯中，他被安置、除名编管于穷乡僻壤，待遇优厚之无稽尚且不论，城市繁荣，市民娱乐之勃兴总体上于他又有何干系？贬谪中的词人生活之惨淡，心境之萧索，从他把自己流寓中之居室命名为“槁木寮”、“死灰庵”^①、“任运堂”^②、“喧寂斋”^③等即可看出。他那些无法编年的艳词，马、祝二先生在《山谷词》笺注中指出“多为其年轻时作品”^④，而黄庭坚自己在《小山词序》中又说：“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⑤如果“使酒玩世”的乐府确作于其年轻“未第时”^⑥，那么，官员待遇优厚之说，于山谷艳词创作怕也是靠不住的。

不仅“专业”文人的创作难以用论者指出的原因圆满解释，那些半道出家的非“专业”文人之走进宋词创作队伍，也是难以完全用上述观点说明，抗金大将韩世忠由将军变作词人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韩世忠与岳飞并肩作战，岳飞遇害，韩解职。这位“生长兵间，不解书”的军人离开部队以后不仅学起了书法，而且染指填词。宋费衎《梁溪漫志》载：

绍兴间，韩蕲王自枢密使就第，放浪湖山，匹马数童，飘然意行。一日，至湖上遥望，苏仲虎尚书宴客，蕲王径造其席，喜甚，醉归。翼日，折简谢，饷以羊羔，且作二词，手书以赠，苏公缄藏之，亲题其上云：“二阙三纸，勿乱动。”淳熙丁未，苏公之子寿父山丞太府携以示蕲王长子庄敏公，庄敏以示予，字画殊倾欹，然其词乃林下

① 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04页。

② 同上书，第305页。

③ 同上书，第308页。

④ 同上书，第1页。

⑤ 黄宝华：《黄庭坚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71页。

⑥ 马兴荣、祝振玉校注：《山谷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道人语。庄敏云：“先人生长兵间，不解书，晚年乃稍稍能之耳。”^①

韩世忠之罢兵职在宋高宗绍兴十一年末（1141）。自此，他“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时跨驴携酒，从一二奚童，纵游西湖以自乐”^②，而创作上述“林下道人语”之词也正在此时。但这样的作品不仅当时要被苏轼之孙苏符“緘藏之”，题“勿乱动”字样，而且要等四十七年之久才能由他们的后人拿出来面见天日。那么，如果以经济繁荣、社会声色享受“刺激”创作的理论观照，则这位将军词人的作品之不敢示人近乎半个世纪是难以解释的。

宋代最后的大词人姜夔、吴文英，其词名冠绝当世，遗韵风传后代，他们却始终都是未出仕的知识分子。姜夔存词80余首，精品不少，其一生全靠亲戚、朋友接济度日；吴文英存词340多首，如此高产却“潦倒终身，晚年困蹶而死”。^③他们又有哪一个在享受着宋王朝优厚的文人待遇？

也许对一代文学繁荣原因的探讨，不能做如此微观极端的个案考察，但是不从个体的特殊性出发，又如何可以得出能够涵盖所有个体情况的宏观、普遍的结论？既然上述词人的创作热情并不一定是待遇优厚、社会对词作广泛需求所“刺激”之产物，那么理解宋词繁荣发展的原因，研究宋词成就之得来，是否还可有其他思路怕还是要具体分析。

钱穆云：“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著天下的重任。”^④宋代自范仲淹放唱“燕然未勒归无计”表现其自任天下、献身国家的情怀以来，其中后期政治领域中，风起云涌的政治革新乃至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莫不在词人笔下有或隐或显，或正或反的表现。为什么宋代自太祖开国至真宗时代，半个多世纪中仅有30余首词作问世，而熙丰、元祐以后北宋词坛却名篇层出、佳作如林？为什么一度唱响词坛、大有扭转宋词发展方向的苏轼词风至北宋后期接踵无人，而词坛却走出了专事技巧雕琢的周邦彦，及以大晟词人为主体的谀颂词人群？理解这

①（宋）费衎：《梁溪漫志》，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

②（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367页。

③ 朱德才：《宋词十八家·吴文英词》，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④ 钱穆：《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58页。

些现象，如果脱离对时代政治的观照，忽略北宋中后期词人之创作生态受到政治挤压、影响情况，那我们至少对宋代词史的理解是不够完善的。

这也就涉及对宋词繁荣原因进一步审视的问题。既然词在宋代的一枝独秀，不仅是独特的文学景观，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现象，那么“文变染乎世情”，风云变幻的宋代政治形势之影响宋词创作就是可以忽视的吗？以北宋词发展为例，在太祖、太宗、真宗等当政的宋初半个多世纪时间里，除朝廷对外用兵之外，一般官员的政治生活相对稳定，此时宋词的创作却可以说一片荒芜；仁宗庆历年间，当范仲淹等拉开政治革新序幕，三十余年后，影响整个北宋中后期政坛稳定的王安石变法继起，北宋词随之也进入其发展最为辉煌迅猛的时期。不仅许多大词人此时登上词坛，且北宋词题材之开拓，抒情内蕴之丰富，也都是在这个时期达到巅峰状态。至北宋末，政争引发的文禁、文祸尤为惨烈时，北宋词之创作随之也进入了它的晚秋时节。故，仅以北宋词的发展轨迹看，政治之影响词体文学发展变化的轨迹是相当明显的。如是，词体文学政治抒情问题的研究就显出了它的意义。

二 推动北宋文人创作心态研究

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今人一般多唐宋并提，实则文化建树上唐不如宋远甚。为诗纵横捭阖如李白，千锤百炼如杜甫，掉颗牙、生根白发亦入诗之细腻琐碎如白居易，居然都没有可值一提的文集单行传世，实非偶然。宋人则是有诗者几乎个个有文集，甚至很多我们如今称之为诗人、词人的宋人，其在当时文名盖过诗名，诗名盖过词名。不少人更是集文章家、诗人、经学家、史学家、词人于一身。宋人学识之渊深，创作力之旺盛，精神生活之宏富实非多数唐人敢望其项背。

然从纯文学角度考察宋人创作，则其无疑太多庙堂文学。宋人文集尽管超过唐人四至五倍，《全宋文》字数亦为《全唐文》十倍之多；宋人存诗千首以上者尽管估计在百人以上，宋诗总量亦近乎为唐诗之五倍。^①但诗、文这种形式的文字一定程度上并不真实展现宋代作家的心灵世界。如

^① 按：1986年立项、北京大学故文献研究所孙钦善先生主持历数年完成的《全宋诗》编纂汇总，宋诗共计247183首，存目323首（句）；另据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曾枣庄、刘玉林先生主持编纂之《全宋文》，收文20万篇，字数一亿左右，是《全唐文》的10倍。

有论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宋人眼中,诗歌也主要是一种言说方式而不是情感思绪的自然呈现”^①。宋人因高扬主体精神,故人人都想要表达个人见解,诗歌即成为其选择的最佳形式,宋诗一定程度上是宋人建构自身话语体系的言说形式,而非情绪意念的真诚流露。那么对宋人来说,其私人情感世界的风风雨雨又在哪一种文体中存身呢?论者多认为就在词中。

这就大致可以解释为什么宋人认为不值一提的“诗余”,何以又成为人见人爱之文体,以致“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词于宋人之可爱,完全在于词人无论怎样抒写内心隐秘难言之事,至少是不用太在乎主流话语、通行话语之说三道四,不会太在乎会招惹谁、得罪谁。作诗稍有不慎会贻人口实,酿成大狱,但在宋代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谁因为写词而陷身牢狱大灾。

诗歌因其体式之古老,传统之久远,故说它已经不是完全开放的系统似并不为过。“江西诗派”谨守作诗之法正说明,诗至于宋,已有深入人心之成规,不可随便作诗已几成人人接受之观念。而词则是兴起未久的体式,是一个较为开放自由的系统。因其兴起未久,故所有权还未有明确归属。于是,柳永以之写市井婉约,苏轼则以之言杰士豪壮;柳永从形式上改造以供其展衍铺写,苏轼则从情韵上变革使之从心所欲,甚至将作诗之法引入词世界,他也无所顾忌。究其原因,实在是因为此时的词体文学在宋人眼里,似乎还是被看作一个开放的、任人自由挥洒的白板系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五代词虽近在眼前,李煜等尽管成就不菲,但因其国为大宋所灭,其人亦多为宋王朝所虏,政治与文化环境的不适宜,使得他们的创作一时还不能成为宋人效法的对象。词在唐五代本已有长足发展,而入宋以后直至柳永登上词坛前,超过半个多世纪时间,词的发展却几乎停滞。这个词史上的“断层”,岂不也预示着宋词从此后也就有了“另起炉灶”的自由?

惟其自由,就少顾忌和限制,抒情上亦可如鱼随水,机任天然。如此,则如论者所惊叹的,即使正襟危坐如欧阳修,亦可在词中一变其庄严的道学家面孔,“自然地袒露出词人真实的感情”。^②

① 李春青:《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② 黄拔荆:《中国词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

也正因为较之宋代他类文体，宋词所流露的感情更具直截真实性，所以，它就有可能为我们展示一幅宋代文人真正意义上的心态图画。尤其仕宦为政之心态，如果说在他类体裁作品中之表现会受到限制，那么，在宋词中它的实现，就会相对宽松容易。于此，北宋词之政治抒情问题的研究，其意义亦可得凸显出来。

政治生活历来是文学表现的重大主题。北宋自“乌台诗案”以后，文学中关乎当代尖锐政治问题的抒情内容，在诗歌、散文中就很少有反映了，但是这一主题并未消匿，它转到了词体文学中。如果我们于之不作较详细的考察、探讨，则对北宋文学的全貌，甚或宋词抒情面貌的观照都会是不全面的。

历史的殷鉴永远是服务现实的。考察北宋词政治抒情状况，评价其政治倾向、政治内容，分析其政治影响、政治作用，探讨其审美抒情中的政治性质、政治意义及表现方式，于当代文学创作亦有借鉴意义，此毋庸多言。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 课题研究现状

在宋词研究史上，20 世纪初迄今是最为辉煌的阶段。20 世纪百年时间里，海内外共计出版宋词研究专著 1342 部，发表相关研究论文超过 5465 篇，而自 2000 年至 2007 年这八年时间里，仅大陆地区又有超过 1500 篇宋词研究论文问世，宋词研究专著的出版数量较之过去更是惊人。仅 2002 年至 2003 年两年间就有 207 部问世，占到该年宋代文学研究专著几近一半。

然在惊人的数字背后，又可见宋词研究的分布很不平衡。20 世纪百年宋词研究论著中，有过千部是属于宋词选本或词人作品集的整理、笺注或一般性赏析。进入 2000 年以来，情况亦大致如此。如 2002 年至 2003 年出版的 207 部宋词研究专著中，有 143 部著作是宋词的相关选本。20 世纪公开发表的宋词论文中，研究北宋词的论文有 3000 余篇，实际上，仅研究柳永、晏几道、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几位的论文就占到了所有研究北宋词论文总数的 80% 左右。进入 21 世纪的这前八年中，此研究分布情